

经济学观察

贺力平 著

个人支票 ● 与信用

●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个人支票与信用



个人支票与信用

贺力平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个人支票与信用 / 贺力平著.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2

(经济学观察)

ISBN 7-201-03993-8

I. 个… II. 贺… III. 经济学—文集

IV. 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92530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赵明东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政编码 300020)

邮购部电话: 27314360

网址: <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 tjrmchbs@public.tpt.tj.cn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2002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5 印张

字数: 150 千字 印数: 1-4,000

定价: 13.00 元

引言：个人信用有多重要？

本书汇集了作者近年来写作的篇幅长短不一的若干文章。这些文章有的谈论微观经济问题，有的谈论宏观经济问题，有的说古论今，有的仅就某个国外问题发表一点议论。看上去这些文章之间除了作者署名之外似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事实上，这些文章都是出于作者对时事经济的议论，对现实经济问题的感应之作。

如果让我们大家跳出各自眼下所处的具体位置，即不管大家从事什么工作，正处于人生发展的何种阶段，生活在地球的这一端或那一端，回答一个共同的提问——“当今全球经济发展中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可能有不少人会得出结论说，“决定全球经济发展的最大变数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有人可能说，“不，当代全球经济中的最大问题是发展的不平衡”。对此，您很可以回应说，“是的，南北世界发展的不平衡的确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但是，如果人们要看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希望，首先需要看到南北经济的发展——中国作为‘南方’之一代表若能继续保持快速发展势头，无疑会给整个‘南方’的经济发展以极大的鼓舞；此外，在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也能给‘北方’经济增长提供巨大刺激；若中国经济增长陷入停顿，萎靡不振，‘南方’就会失去榜样，‘北方’就会失去激励——这不正好说明中国是全球南北经济共同发展的关键所在吗？”

下一个智力挑战提问是：“现在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生活在中华国土上的人们最有发言权。如果读者们近一两年来一直在关注国内经济事务的时事报道以及众多经济界和经济学界人士的言论，那么不难发现对这个问题的已有应答是多种多样、五花八门的。对这种情形其实不必感到费解。首先，人们对这个问题中的“问题”有着不同理解，有的是从经济学教科书中常说的那些“制约性资源（例如资本、劳动力、土地及土地矿藏物等等）”的角度来理解，有的是从政府决策面临的各项任务的对紧迫性角度来理解，有的则是从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对的需求规模制约角度来理解，等等。

如果我们将“问题”的含义进一步限制在一个特定范围——比如说，限定在影响国内人们经济行为的最大因素——中，再问“现在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许多人士对此发表的看法就比较接近了。近一两年来在国内经济生活中日见突出的两个话题是“建立信用经济”、“破除审批经济”。“建立信用经济”的含义是各个经济行为者之间的关系要建立在相互透明和信任的基础上，这些经济行为者包括企业、事业机构、居民和各种政府机构，他们之间的关系应当是透明的，可相互信任的。“破除审批经济”在直接层面上指减少或废除政府部门颁布的各种不合理规章制度，给企业和居民的经济活动以更大的自由空间，在深层次上则指改造政府与经济的关系，按照市场经济中的公平、合理和透明的基本原则调整政府的组织管理方式和行为方式。很多学者和经济界人士已经指出，目前中国存在着太多的政府审批权，一些政府机构也太爱滥用行政审批权；同时，社会成员之间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缺少相互信用、各种信息失真甚至欺诈现象频繁发生。

为什么人们会认为“审批经济”和缺少“信用经济”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问题？两个基本理由：

第一，“审批”多了，“信用”少了，一些正常的经济活动就受到妨碍，相应的产出就不会出现，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就可能因此而减少。试想，您作为企业家发现了周围的社会出现了一种新需求，您想要组织生产经营去满足这种需求，从中也为自己谋取经济利益。但是，政府官员告诉您，您在得到审批之前不能从事这种经营活动，而什么时候您能得到审批他也不知道。面对此种形势，您要么放弃经营念头，要么以另一种方式组织经营，即在存在审批失败风险的情况下尽可能以低成本方式组织经营，这样即使未得到审批，您的损失也可能降低到较小的程度。放弃经营显然等于社会失去了一块产出；降低成本经营也等于社会总产出增长的水平降低了，因为按正常成本投入的产出通常伴随一个较高的水平。

“信用”少了也有类似结果。在中国，人们把相互经济往来称之为“做生意”。对多数生意行为来说，一定程度的信用是不可少的。一方若对对方的信用有疑问，要么不与对方做生意，要么采取一定的防范措施。不做生意显然意味着没有产出，社会的经济增长受到不利影响。采取防范措施的情况稍微复杂一点，需要有所剖析。有的生意人具有一定的市场垄断力量，采取了让对方交纳“风险抵押金”的办法，例如供货商让买家先付全款，出租汽车公司让司机先交存一大笔钱后才出让出租车牌照使用权，银行让借款人先存入一大笔存单和票据后再发放贷款，等等。这些措施能将出让一方的损失风险降低到最低程度，因而具有合理性。但是，从生意对方的角度看，这些措施大幅度提高了做生意的成本，降低了资金的使用效率，其对社会经济效益

的影响是不利的。

第二,“审批”多了,“信用”少了,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还表现在社会成员经济行为的扭曲上。如果人们知道生意的成败兴旺主要取决于“审批”和长官意志,人们就会将更多的资源用于与长官们的公关;长官们认识到手中权力的经济价值,便会愈加变本加厉地想方设法扩大这种权力,运用种种冠冕堂皇的口号和借口来证明集权的合理性。多年以前,一些经济学者将生意人将资源用于与政权的公关这一现象称之为“寻租”。现在,一些学者进一步认识到,某些人努力通过扩大行政权力来满足社会上寻租行为的需要并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这种情况可称为“二次寻租”或“再寻租”。再生寻租与原生寻租在中国的相结合,演变出了一个多么庞大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体系——这个经济的总体增长速度令人惊叹,但其微观经济效率却值得疑问。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已经再次提醒人们应当高度重视微观经济效率对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的关系。

顺着思维的逻辑,本书作者感到,在“审批”多了与“信用”少了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相辅相成的关系。首先,“审批”多了可能是“信用”少了一个结果。一段时间,各种信用社和金融机构在中国大地风起云涌,其中不少仅仅是为了快速骗取客户资金并在后来事实上给客户造成巨大损失。面对这种严重缺乏信用、金融风险四处蔓延的险象,当局不得不采取强制性的控制手段,强化审批权,而且将政府系统内部的审批权进一步集中起来(包括从下级政府收到上级政府手中,从地方政府收到中央政府手中)。其次,“信用”少了也可能是“审批”多了一个结果。在很多领域中,“审批”是划分进入和未进入者的一道关口,得到审批者进入,得不到审批者不进入。进入者得到审批权的保护,开

始生产质价不符的产品。药品、学位、电信服务等领域中不同程度地都存在这种情形。

中国经济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时代曾有过“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说法。“统”指的是集权，集中审批权，“乱”可以理解为缺少规范和信用。计划经济时代“统”与“乱”之间的交替关系很可能在今天演变成了“审批经济”与“信用经济”的交替关系，或者说，后者是前者的一种新表现或延续。

信用是这么重要的一个事物，人们甚至可以说，不从根本上改善中国经济中的信用行为和信用关系，中国经济就难以顺利完成向现代成熟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进程，就难以摆脱旧计划经济体制的桎梏，我们大家还只得继续生活在政权主导型的经济体系中，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眼睁睁地看着失去提高效率 and 国民竞争力的时间和机会。

信用既然这么重要，那么应当如何推进信用建设呢？按照政权主导思维逻辑，很容易想到请中央政府发布命令，再次实行全国军民精神大动员的做法。这个想法显然犯了两个错误：错误一，如果这个想法中包含着直接使用行政权力来推进信用建设的意思，那么可以说犯了一个“枪杆子能用来改造人的思想”的错误；错误二，如果这个想法中包含着寄希望于精神感召力量的意思，那么可以说犯了宗教原教旨主义者常犯的错误，即不顾现实地夸大精神感召的力量。

信用建设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说这话的含义是，信用建设本质上不是一个人们调整道德行为的问题。在信用建设问题上，道德讨论很容易与经济讨论混淆在一起。一顾客发现一商家出售了价高质次的商品，骂这个商家缺少道德。这可能没有错。一万万顾客发现一万万商家出售了价高质次的商品，当然

也要骂商家们缺少道德,甚至说商家们道德沉沦。这可能也没有错,但轮到社会科学家发表意见时,如果他们依然重复顾客们的看法,申明应当加强对那一万万商家的道德教育,这些“社会科学家”们肯定是犯了天大的错误。姑且不说“道德”是否可以通过“教育”来加以改善,难道看不见在任何社会中都不可能存在有独立于一万万顾客的一万万商家这一事实吗?一个顾客与一个商家是不同的人,但在一个社会中,全部顾客与全部商家是同一批人,或者更准确地说,顾客作为一个整体与商家作为一个整体是同一批社会成员。如果作为顾客身份的社会成员是有道德的人士,难道他们作为商家身份的社会成员时就不讲道德吗?道德分析者也许可以发明一个所谓“身份虚伪”的概念来表示“您当买家时要求卖家讲道德,您当卖家时却对买家不讲道德”,但对普通的观察者来说,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道德可言:只要大家当卖家时都倾向于不讲道德,那就没有道德,因为每个都必须当一次买家的同时或前后当一次卖家。

很明显,在这种形势下,您难以寄希望于让“讲道德的顾客”去教育不讲道德的商家。大批商家如果是不讲道德者,大批顾客即使不是不讲道德者也是道德虚伪者——显然,您至少不能让道德虚伪者去承担从事道德教育的任务。

道德分析把我们带进了一个无出口的胡同。这个胡同的尽头正是经济科学分析的开始。

本书收集了几篇作者谈论个人支票与信用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所包含的一个基本思想是,信用建设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或者说,人们最好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社会成员有没有信用,有多高程度的信用,可以视为社会成员自身的一个选择问题,即他们自愿选择什么样的信用(或“讲道德”的程度);

制约我们信用选择行为的重要因素是社会对他们信用选择行为的报酬或回报(包括处罚)。用严谨的但却有些别扭的专业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负报酬”;信用的普及一定需要社会经济活动中提供足够多的正刺激信号;正常的商业活动(“做生意”)自身就能不断产生出这些正刺激信号,但遭到扭曲的商业活动却往往不能发送出这种正刺激信号;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包括各种审批)在很多情况下导致了刺激信号的失真和扭曲,因此,需要改善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审批。本书收进的文章还有一个观点:全社会信用建设可以从个人信用建设开始,从银行与个人客户之间的关系开始;当然,在中国,新的信用建设如果能从政府机构开始,尤其是从高级政府机构开始,那是最好不过的事情,那一定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极大地推动全中国的信用建设,保障中国经济在未来时期的持续健康稳定的增长。

在过去若干年中,作者得益于许多报刊编辑的信息沟通和写作支持。没有这些支持和帮助,作者无法写出本书汇集的多篇文章,要写出来了也不会是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为此,作者希望能借此机会向他们表示感谢。特别应提到的有:中英双语刊物《英中经济动向》(英文名为 China Business Impact)编辑周丽君,《国际经济评论》编辑部主任邵滨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詹小洪,《经济学消息报》总编辑高小勇,《新远见》主编王文,《中国经济导报》编辑史颖。还有许多这里未被提及者,他们的名字对作者来说具有同样的鼓舞和支持力量。

贺力平

2001年12月 北京

目 录

-
- | | |
|------|------------------------------------|
| (1) | 引言:个人信用有多重要? |
| (1) | 世纪性的跳跃:中国进入中等发展水平 |
| (5) | 一万亿美元 GDP 的微观意义 |
| (8) | 再认识垄断 |
| (11) | 微软 vs. 邓丽君:垄断与流行的区别 |
| (14) | 单位弹性与企业竞争战略 |
| (17) | 新经济需要新“婆婆”吗? |
| (20) | “打假”应属政府专权吗?
——兼谈“王海式”打假行为 |
| (23) | 政府出版物应按什么原则定价? |
| (28) | 资金是中国经济所短缺的吗? |
| (31) | 寻求发展的新思维
——读《1999/2000 年世界发展报告》 |
| (35) | 房价在中国为什么这么高? |
| (39) | 股权比重争论的意义何在? |
| (42) | 挑选优胜者:谈机构投资者与上市公司治理结构 |

- (49) 克服信息不对称障碍:谈金融机构与中小企业发展
- (57) 如何在中国普及个人支票?
- (62) 信用环境不好,从何做起?
——答罗凯先生
- (68) 分析人民币汇率:还能再简单套用“小国模型”吗?
- (73) 正视通货紧缩
- (77) 如何化解“过剩生产能力”?
- (81) 储蓄高升引出的思考
- (85) 汇率是一个平衡器
- (88) 无限风光靠扩张?
- (91) 不止是一个世纪的跨越
- (94) 汲取邻居的经验教训
- (97) 新经济的“旧”周期
- (100) 经济增长纵横谈
- (115) 回顾 20 世纪经济增长:几点个人体会
- (125) 国际经济俱乐部中的持筹者
——谈国际竞争中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 (133) 改革国际货币制度:寻求深层共识
- (142) “持筹者经济”:工党的新经济口号
- (146) 英国的欧洲难题:公民投票党提供了较佳出路吗?
- (150) 税收问题:工党与保守党大选决战的主战场
- (154) 微妙的平衡:英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松紧摆动
- (158) 围绕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论战

——析新著《中国的兴起与俄国的衰落》

-
- (162) 继承人之死:一个现代金融家族王国的悲剧
- (167) 哀哉,投资者!
- 层出不穷的投资界丑闻何时休矣?
- (173) 布罗姆伯格与金融讯息业:新潮流中的新舵手
- (179) 预选、大选、欧元:英国经济走向何方?
- (184) 英国 1997 年大选:“持筹者资本主义”会取胜吗?

世纪性的跳跃：中国进入中等发展水平

不少人认为 20 世纪末的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全球化的意思多种多样，其中至少有一点是公认的，那就是世界各地的人们现在比以前更喜爱相互比较了，看看谁的生活水平高、谁发展得快以及谁最可能成为下个世纪各国经济增长的领头羊。

我们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几十年中，基本上走了一条封闭或半封闭的道路。那时，我们爱说我们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但这是关起门来的话。当国门随改革开放而张开的时候，国人却发现不像是这么一回事。地球上有多好多地方的人民生活水平大大高于我们。即使在 90 年代初，我们当时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不是令人鼓舞的。邓小平 1992 年南巡讲话中就指出过，“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①。

普通人通常根据直观感觉来比较，专业人士自然喜欢使用具有广泛可比性的数据指标。世界银行作为一个国际性的权威机构，每年都发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国民收入统计数据，并据此给各国排座次。世界银行最新公布的《世界发展报告

①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 年 1 月 18 日～2 月 21 日），《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第 375 页。

(1998/1998年)》认为中国在1997年人均国民收入按照现行汇率计算为860美元,已不再属于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而是属于中等发展中国家。可以说,自从国际社会发明了这种形式的排名榜以来,中国座次的这个变化是最富有历史意义的一次。

世界银行自1978年以来每一年都公布《世界发展指标》,在那里我们中国每一年(直到1997年之前)都被列入“低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个组别中,有人口繁多、宗教习俗浓厚的南亚次大陆国家,有内战连绵不断的印度支那半岛上的国家,也有许许多多摆不脱部落纠纷的黑非洲国家。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与这些国家排列在一起,不能说是我们脸上的光彩。

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梦想摆脱压迫、贫困和落后,但在漫长岁月中没有做到。近代以来,我们在内外压力下,不仅没有摆脱贫困,而且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更加落后了。19世纪末恩格斯有一次在给他友人的信中说“中国的生活水准即世界上最低的生活水准”^①。多年来,亿万的中国普通老百姓多么想有机会过上和平和温饱的日子,一劳永逸地摆脱恐惧和拮据。等待了多年,改革开放才使这样的梦想变成现实。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城市居民虽然没有了饥饿的压迫,但还不能摆脱配给制的约束。从购买卫生纸到购买自行车,我们的许多城镇居民都不得不服从政府机关颁发的名目繁多的供应证。在农村,大规模的饥馑或逃荒虽然少见,但贫穷的人们挨饿受冻的现象却屡见不鲜。只是靠了改革开放,蕴藏在人民中间的活力才得以焕发出来。市场经济体制使人们加倍地工作,追

① 恩格斯,1892年9月22日致尼弗丹尼尔逊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8卷,重印于《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版,第126页。

求效率,学习国际先进经验。商品经济中的“无形之手”指导着社会将资源分配到最符合社会需要的地方,全社会成员的物质福利在竞争机制中和政府明智的宏观经济管理下获得最大程度的满足。

我们从以前的“低收入国家”上升为“中等收入国家”,还得益于近年来政府实行的汇率稳定政策。世界银行计算各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参照的是各国货币现行的对外汇率。如果一国的货币老是不停地对外贬值,那么,不管按什么指标看它的经济取得了多大的增长,按照国际价格(比如说美元)来计算,它的人均国民收入都可能不增长,甚至会出现下降。世界银行 70 年代末推出《世界发展报告》时,说中国当时的人均国民收入已达到了 390—410 美元。但在整个 80 年代中,虽然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很高,但中国人均国民收入按国际货币计算却一直在 300 美元上下徘徊。究其原因,主要是人民币数次对外贬值。大幅度贬值的一个后果就是,同样多的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能购买到的商品减少了。例如,从 80 年代到 90 年代初,由于人民币贬值,我们的院校和科研部门从国外购进的进口图书资料实际数量可能不仅没有任何增加,反而还减少了。

稳健的宏观经济管理使我们避免了东南亚国家近来所遭受的严重金融危机。在那场危机中,一些国家的货币出现巨幅贬值,它们的人均国民收入甚至退回到 20 年以前的水平。人民生活的苦涩滋味,不难想象。

但是,我们不能沉浸在庆幸中。中国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内部的发展很不平衡。我们还有许多同胞至今生活在贫困线下。我们的不少企事业单位还缺乏足够的活力。我们的法律体系还有待健全,我们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已受到损害、需要大力改

善。相对世界先进国家,我们与他们在人民生活水平上、技术上和管理体制上的差距仍十分明显。我们远不能满足于现状。中华民族是有雄心壮志的。我们要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全体人民的普遍幸福。

中等发展水平意味着我们开始拥有了一个较为积极的继续发展和实现全面现代化的经济基础。我们需要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如果我们停顿下来,不仅后来的国家会超过我们,而且已走在前面的国家还会甩开与我们的距离。“沉舟侧畔千帆过”。在当今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中,我们丝毫不能松懈下来。我们必须全力以赴,保持我们的政治稳定,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稳妥地处理各种新旧矛盾,抓住全球化带来的机会,化解全球化伴随的风险。

可以相信,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在未来岁月中将会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新的积极的贡献。正如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与俄罗斯总统联合发表的《世纪之交的中俄关系》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将与国际社会中的其他成员一道忠实于和平、公正和合作的信念,并努力按照这一信念行事,使 21 世纪能够建立真正的物质、政治、法律和其他保障,构筑一个能避免战争、压迫、破坏、暴力的世界秩序,为人类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原载《科学时报》1999 年 1 月 1 日创刊号)